

# 中國農民起義論集

五十年代出版社

## 前言

這本小冊子裏收集了有關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論文十五篇。這些論文只是關於我們祖國勞動人民的輝煌燦爛的文化和革命的優秀傳統的歷史資料，提供大家參考。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教導我們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此，我們認為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問題是揭示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最重要的關鍵問題。列寧在「告農村貧民書」中也曾指出：「當農奴制存在的時候，一切農民羣衆曾經與那些由沙皇政府所保衛祖護和幫助的壓迫者——地主階級作過鬥爭。那時農民還不能統一起來，那時農民還完全被黑暗所籠罩着，農民在城市工人裏面還沒有找得助手和兄弟；可是，農民終究盡其所能作了鬥爭。農民不怕政府野蠻的追究，不怕屠殺和剷滅，農民不信神父的話；神父拼命證明農奴制是聖書所贊同和上帝所批准的（當時的教主斐拉列特竟公開地這樣說過！）；農民四處騷動起來，結果政府害怕全體農民底總暴動，於是作了讓步。」◎斯大林扼要地說：「農民要土地，他們做夢也夢見土地，顯然他們在沒有奪得地主土地以前，是不會安靜下來的。」◎這些經典論著指示了我們研究農民起義的最基本原則。

中國農民在長期的封建制度壓迫下曾進行過無數次的起義鬥爭。這些次的起義鬥爭就其本質來

◎「列寧文集」，第一冊，第二〇九頁。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九五頁。

說，都是農民的自發的反封建的運動，不過隨着封建社會的發展每次起義也就有所不同，而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們也就認為：對於在封建制度時代的各個不同階段中的農民起義進行具體地分析和探討，便有助於對農民起義的一般規律的更多的認識。這樣在我們學習上是多少有些幫助的。大家最熱的秦朝末年陳勝吳廣所領導的農民起義，首先提出的口號：「天下苦秦久矣！」而陳勝吳廣等具體行動是完全從人民的願望出發，英勇地對殘暴的封建主展開了生死的決鬥，因此農民軍的「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是廣大勞動人民所熱愛所歌頌的史蹟。從此以後，在漢朝末年黃巾軍的武裝起義提出了「蒼天當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憧憬着「太平道」「最高和平」的原理，準備去推翻劉氏的封建王朝，來建立自己的政權。在隋朝末年農民起義軍首領王薄等曾提出「無向遼東浪死歌」，反對統治者對高麗的侵略。在唐代黃巢所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曾提出：「黃王起兵，本為百姓」的口號，對貪虐的封建地主階級實行掃蕩。在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起義軍的口號是：「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北宋末年方臘方肥等起義時，曾提出「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教義。鍾相楊么當南宋初年在湖湘一帶起義時提出了「我如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而元末劉福通所領導的白蓮紅巾軍大起義在「天道魔軍殺不平」的嚴正號召下，展開了偉大的反蒙元鬥爭。在明末張獻忠、羅汝才等起義軍在鄂北山區駐屯時，更聯合聲明：「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這句話裏充滿了農民在千百萬次血汗鬥爭中要求「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同時李自成、李巖等更明確地提出「均田、免賦」的兩大政綱。到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更提出了「天朝田畝制度」。這一系列的土改革命的綱領，正是在農民要求奪回土地，反封建反剝削的鬥爭實踐中的具體思想反映。農民的長期鬥爭，因限於歷史條件，沒有工人階級先進政黨的正確領導，歷次都陷於失敗，不能實現其革命的要求和獲得真正的解放，但每次起義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農民長期多次起義充分地證明它是打擊封建統治的主力軍。

中國農民在每次起義時，因為封建統治的壓迫形式在一定時期內有所不同，所以農民起義的鬥爭形式也因而各異。在戰略上或結山爲寨，或柵水爲營，或採取流動游擊戰，或堅守一定的地域，或猛攻封建主的大都會。另外，又因為當時歷史環境的變化，所以農民鬥爭的主要方向，有時指向國內封建貴族，有時抗擊外族入侵，有時是聯結國內各族人民反擊國內的封建統治者，有時支持國內統治集團去抵抗外族的侵略和壓迫，有時是堅持外抗侵略勢力內反統治集團的兩面奮鬥政策，有時農民起義軍的鬥爭，雖然從形式上看是抗擊外族的鬥爭，而本質上依然是反封建反壓迫的階級鬥爭，所以可以說農民起義的鬥爭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對發展生產和保衛祖國的光榮革命傳統分不開的。

現在這本小冊子裏所談到的農民起義，僅只是中國歷史上大小千百次農民起義史中的一些例證。在史料上我們是努力搜集比較原始的或詳細的記載，並隨時揭露或批判舊史書上對農民起義軍的醜化和歪曲。在史實上是想發揚祖國勞動人民光榮愛國的優秀傳統。在各篇論文之間更因為對各個問題的提法和重點稍有不同，也就有些論叙或意見相互不能勉強求其完全一致，但仍然從相互學習和商榷問題的態度上一併提供出來。另外，本書是一種論集，有許多次重大的農民起義，在本書裏還未及收入，準備在續集中能更多地收集一些。這裏我們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給了我們學習和研究中國社會歷史以最完善也最銳利的武器，但我們多是初步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對於研究祖國歷史這一科學工作，自然要時刻努力，同時對於各人自己寫出來的論文，則又感到「初生之物，其形必醜」，誠懇地希望看到這本小冊子的同志們，盡量給予我們以寶貴的幫助、指正和批評，以便再版時能作一些必要的補充和改正。

一九五四、二、二七。

# 目錄

|                      |         |
|----------------------|---------|
| 前言                   | (一)     |
| 漢代太平道與黃巾大起義          | 李光璧(一)  |
| 南朝唐寓之所領導的農民起義        | 賴家度(三)  |
| 有關隋末農民起義的幾個問題        | 漆俠(三)   |
| 試談晚唐的農民起義            | 鄧廣銘(四)  |
| 黃巢大起義                | 楊志玖(六)  |
| 關於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幾個問題   | 丁則良(六)  |
| 宋江考                  | 張政烺(八)  |
| 方臘的起義                | 錢君彥(一〇) |
| 談鍾相楊么的起義             | 漆俠(一〇)  |
| 明中葉荆襄山區劉通李原所領導的流民大起義 | 鄧廣銘(二〇) |
| 明中葉劉六劉七的農民大起義        | 賴家度(二〇) |
| 山東榆園起義軍抗清史蹟初探        | 李光璧(二五) |
| 農民起義軍在川鄂地區的聯明抗清鬥爭    | 李光璧(二六) |
| 呂梁山區農民起義軍的抗清鬥爭       | 賴家度(二七) |
| 宋景詩起義文獻初探            | 鄧天挺(二八) |

# 漢代太平道與黃巾大起義

李光壁

## 一

東漢末靈帝中平元年（紀元一八四年）的黃巾起義是一個全國性的，極其壯烈的農民大暴動。地區達到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時間綿互有二十餘年之久，前後參加人數至少有一二百萬人。比西漢末農民起義軍的隊伍壯大得多，這可證明東漢農民痛恨統治階級比西漢還要厲害。這一次農民暴動，有一個特點，就是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黃巾所奉的宗教，叫做太平道。若推溯太平道的淵源，當上推到西漢時代。漢書李尋傳說：

「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

這是一段太平道初期的材料，成帝時甘忠可造太平經，他本人雖然死在獄中，可是弟子們還是私相傳播。李尋傳又說：

「哀帝初立（紀元前六年），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率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

可見太平道徒夏賀良得到了李尋（時爲黃門侍郎）的篤信，以及舊日同門當時爲長安令的郭昌的

幫腔，得以由李尋上聞於皇帝，數次召對，當時夏賀良等見哀帝久病，於召見時，上言應當改元易號，如此可以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哀帝聽了他的話，就下詔以建平三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但是過了一個多月，哀帝的疾病並沒有好，這時賀良等又想要變更政事，上言應更換丞相御史，用李尋、解光輔政，這種舉動觸怒了漢哀帝，下賀良等獄，治以執左道亂朝政的罪名，將賀良等殺死，李尋、解光徙戍煌煌郡。（以上據李尋傳）

這一次太平道徒，企圖用宮廷政變改良政治的活動失敗了。但是在民間的傳播仍然照常進行，而且由此次失敗的教訓，更可以加強的聯繫羣衆，做爲進行推翻專制貪污腐化政府的基礎。

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經不傳於世，內容無由得知，不過，我們看後世的道藏第七百五十冊至七百五十五冊，所收的太平經，凡一百一十九卷，缺前五十卷，這部太平經後面有太平經複文序云：

「子吉初得惡疾，殆將不救，詣帛和求醫，帛君告曰：吾傳太平本文，可因易爲一百七十卷，編成三百六十章，普傳於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愈疾兼而度世，于君受教，究極精義，敷衍成教。」

後漢書襄楷傳說：

「初順帝時，瑯琊宮崇詣謁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由以上兩種記載看來，知道原書本是一百七十卷，後來變爲一百一十九卷，其間分合情形，已難詳考。可是，抱朴子遐覽篇有太平經五十卷，九敬經一卷，甲乙經一百七十卷。或者這三書原爲一書，前二者包括於甲乙經中，以後太平九敬都另外分出，於是甲乙經僅剩下一百一十九卷，而變爲後日的太平經了。這不過是一種推測而已。

後來的太平經，大概是增竄包元太平經而成，其間跡象很多，例如太平經卷五一卷六十八都提過

今古文書真偽的事，這是反映西漢末年的史實。又如，太平經卷九十一、七十一都提到河洛圖讖之書，考河洛圖讖之書，出於西漢之末，西漢末東漢初講學的人，牽引內學，求合圖讖是一時的風尚，由此也可見其時代色彩。又如太平經卷九十一，說到「天戒校書，脫一事答三十，脫十事答三百。」這也可反映出成帝時集書校書的史實。其他例證還有，總之，太平經中西漢的時代成份很多，可以看出它和包元太平經一定有很深的關係。再從地域方面看，傳包元太平經的甘忠可是山東人，于吉得太平經是在曲陽、漢的曲陽，在今日江蘇邳縣一帶。傳于吉神書的宮崇又是瑯琊人，上書的襄楷是臨陰人，都在山東地方，所以兩種太平經的民間傳授在山東、蘇北一帶有深厚的關係是不難想見的。

## 二

鉅鹿人張角所以能興起太平道，和他的家鄉環境很有關係。在西漢元帝初元年間（紀元前四八年），已經有鉅鹿張姓，做過宗教性的活動。漢書郊祀志說：

「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韓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記載韓陽侯江仁以「（元帝）永光四年（紀元前四〇年）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免」。我想鉅鹿神人，或者就是張宗所尊奉的神人，這位侯爵寧可捨棄自己的尊貴地位，而依隨方士，可見他信道之篤。張角和張宗的家世恐怕有些淵源。如此，張角做宗教宣傳，是有所受的了。

據上文所引後漢書襄楷傳，張角後來得到了于吉的太平清領書。後漢書這一段記載，是抄自三國志注引志林的話。志林的作者虞喜，是東晉初會稽人，正是于吉嫡派傳授的地方。所以知道張角得書的來歷，能够記敘出來。

張角太平道的能够迅速的發展傳播，是因為漢末社會黑暗污濁到極點，在人民的飢餓悲號裏，張

角出現爲苦難人民的救星。所以得到民衆的信仰。東漢的社會是大商人地主豪族當政，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所說：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放樂，列乎深堂。」

不僅京師如此，地方上各處都有豪富的商人地主，昌言損益篇說：

「豪人貨殖，館舍遍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輪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

這些大商人地主的豪族集團，是以血緣宗親爲主而有依附的門生故吏，隸屬的賓客奴僕。中央的外戚宦官，高級官吏，是這種集團，地方上強宗大姓，也是這種集團，他們在政治上是統治階級，在經濟上他們領有廣大的土地並經營商業及放高利貸，以壓迫剝削農民，農民就不得不「父子低首，如事富人，躬率妻孥，爲之服役。」（崔實政論）一遇荒年，農民就「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同上）了。

在政治上，和帝安帝以後，外戚宦官，互相傾軋，相繼執政。這些人代表當時統治階級中最腐敗的部分，貪污腐化，惟利是圖，人民饑饉流亡，成了常事。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政治，招來嚴重的外患。羌禍是東漢一大問題，也是造成黃巾起義的間接原因。羌人在中國西部甘肅青海等地，西漢時屢次叛降。東漢時光武、明、章、和四代，連次內侵，都被擊敗。漸漸分部投降，散居郡縣，但降羌「多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成仇怨。」（後漢書西羌傳）可見羌亂也是地方豪強壓迫引起的。安帝永初元年，又要徵發羌人出征西域，衆羌叛變，內犯司隸，南侵益州，漢兵不能敵，只好棄守邊郡，徙邊民於內地，人民不願離開故土，在官吏的強迫下流動。內遷的人民，奪土失業，又遇蝗旱，逐道東走，流離分散，於是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遍地都是饑民。羌亂十餘年，漢廷用兵，花費二

百四十億（西羌傳）結果還是棄地徙民。以後從順帝到冲帝，羌人仍舊叛服無常，漢廷用兵，花費八十億。官將侵蝕兵餉，士卒騷擾百姓，邊民苦不堪言，桓帝時皇甫規、張奐打了幾個勝仗，羌亂平息。靈帝時又叛，皇甫規的姪子皇甫嵩又將羌亂「討」平。但是漢國力已疲弊不堪了。誠如西羌傳所說：「惜哉！敵寇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

漢廷既因平羌而空虛，遂加重內地的苛歛以爲補償，桓帝延熹八年（一六五）每畝增稅十錢。這正是外戚宦官內閣最劇烈的時候，次年發生了第一次黨錮之禍。黨錮是統治階級內部比較開明部份的士大夫們，要求執政，改良政治，以維持統治。結果反爲宦官誣以「圖危宗社」的罪名，禁錮終身，不得作官。靈帝建寧二年（一六九）又有第二次黨錮，黨人大受打擊，宦官氣餒黨天，靈帝的大宦官十常侍，都封爲侯。黃巾起義之後，當時張鈞上書說，就是十常侍所引起的。後漢書張讓傳：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靈帝的貪利比桓帝更甚。桓帝延熹四年已開賣官之端：桓帝紀。

「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更變本加厲，公私兼賣，靈帝紀云：

「光和元年（一七八），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直至黃巾起後，靈帝還於變亂中以修宮殿爲名，收天下畝十錢，統治者的血手，還是加緊扼住農民的咽喉。這樣，起義者如火如荼，就更多了。

張角看到了當時士大夫改良運動的失敗，看到了農民在暴虐政治下的苦難，看到了宗教是聯合農

漢代太平道與黃巾大起義

民最好的工具。他遂以傳教主的面目，出現於農民大眾之間。靈帝時，正是中國史上大瘟疫時代。張角乃利用符咒聖水替農民醫病，後漢書皇甫嵩傳：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

我們不相信符水能够治病，不過饑餓的農民，一旦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安慰，也就豁然而起。沒有黑暗的政治，沒有廣大的飢民，符水咒術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張角就用這樣的神道設教，在廣大的農民中獲得了信仰，因而擴大了他們的組織，壯大了他們的隊伍。後漢書皇甫嵩傳：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和張角同時領導農民革命的五斗米道的教主張修，也是用符水療病。所以魏志張魯傳注引典略說「修法略與角同」。張修被另一五斗米教主張陵的孫子張魯所殺，併有其衆。據雲笈七籤張陵的活動區域，有二十四治。這大概和三十六方差不多的意義。二十四治之中，二十三治都在雍州、益州，只有洛陽一治不在此區域。張角的三十六方，主要分佈在前述八州。雍、益二州沒有在內。這大約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在發展區域上的不同之處。

### 三

張角等散佈「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預言，並且在京師衙門和州郡官府牆壁上，書寫白土書「甲子」字樣。荆揚方面渠帥馬元義，常往來洛陽，探聽官府動靜，並且收買宦官，響應農民暴動。張角等準備在中平元年（甲子年，一八四年）三月五日起義。但是在革命隊伍中，出

了一個叛徒，張角的弟子唐周，到政府告密，後漢書皇甫嵩傳記云：

「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諷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軍裂元義於洛陽。……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蛾（即蟻）賊。殺人以嗣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黃巾起義後，靈帝立即召集羣臣會議，大將皇甫嵩及內侍呂強等請解黨禁，靈帝採納，統治階級拉攏在一起對付農民起義，靈帝把中藏錢和西園廐馬拿出來分給軍士，封外戚何進爲大將軍屯兵守洛陽，徵發防羌胡的五校三河騎士並招募精勇共得四萬餘人，由幾員大將分統，北中郎將盧植北到冀州攻擊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共同對付豫州潁川郡的黃巾。朱儁的官軍進至潁川境內，便遭受到黃巾首領波才的痛擊，大敗潰退，皇甫嵩的官兵困守長社，被黃巾包圍，但是黃巾究竟是一羣沒有戰鬥經驗的農民，他們依草結營，警戒疏忽，五月間有一天夜裏，皇甫嵩因風縱火燒黃巾營，乘勢攻擊，黃巾遂轉勝爲敗，又逢靈帝派騎都尉曹操來援，朱儁曹操合兵進攻，大敗黃巾，屠殺農民軍數萬人，六月曹兵又乘勝破汝南郡陳郡黃巾，豫州三郡黃巾起義被平息。

皇甫嵩與朱儁又分兵：皇甫嵩北征兗州東郡的黃巾，秋八月，打敗黃巾，屠殺農民軍七千餘人。朱儁西攻荊州南陽郡黃巾，到十一月，也攻下宛。

六月間，北路盧植官兵與張角相持於廣宗，宦官們進讒言說植「固壘息軍」，靈帝也嫌盧植一時不能見功，改命董卓代替盧植，也是「無功而還」，統治階級文人作的後漢書如此說，可見董卓是戰敗的，否則何以「無功」，何以又肯「還」呢？這可見黃巾主力張角一支隊伍戰鬥力的強盛了。這時皇甫嵩已破東郡黃巾，被詔去攻張角，不幸，在這時候張角死去，農民軍中失去了戰略上的指導者，

形勢當然起了變化，廣宗的黃巾奉角弟張梁爲首。張梁也很能戰，嵩一時不能得勝，這一次又是黃巾起義軍警戒不夠，皇甫嵩於夜間準備好，鷄鳴即進兵大戰，張梁陣亡，皇甫嵩殺農民軍三萬餘人，農民軍投河死者五萬多人，可見這是一個主力戰了。這是十月間的事，十一月，皇甫嵩又攻張寶於下曲陽，張寶戰死，農民被屠殺十餘萬人，因爲屠殺農民的「功績」，嵩得領冀州牧封槐里侯。朱儁封西鄉侯，黃巾起義軍的主力，經過九個月的戰鬥失敗了。

## 四

黃巾暴動的高潮雖然過去了，但飢餓的農民，遍於全國，所以不久黃巾餘衆和各地飢民，在各式各樣旗幟之下起義了。後漢書朱儁傳云：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髻、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橡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咽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賊寇，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

由此可見繼黃巾而起的集團之多。他們各領衆二三萬或六七千，「黑山賊」百萬就是他們所合起來的。據魏志張燕傳，黑山先奉張牛角爲首領，牛角死，遺囑合其衆奉燕爲首，燕本姓褚。至此改姓張。張燕雖與各地農民軍「更相交通」；但是他不能統一組織領導各地處於分散狀態的農民暴動，尤其可恥的，是他的意志不堅定，受了靈帝的招撫，拜平難中郎將。命他領有河北諸山谷，每年可以奉孝廉，計吏，後來，張燕又南下攻河內郡，漢廷命朱儁抵禦他，止於擊退，傷也不敢進討。後來張燕幫助公孫瓚與袁紹爭冀州，連年戰爭，勢力消弱，至獻帝建安十年，曹操破袁紹，才降於曹操。

黑山起義軍也有宗教成份，因爲其中有的首領名左大賢，這和張角自稱大賢是一樣的，又黑山百

萬中有白波集團，這是黃巾餘黨，因為據靈帝紀：

「中平五年（一八八）二月，黃巾餘賊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

白波得名，就因此故。黃巾餘衆在郭太等領導下以太行山爲根據地，轉戰晉、豫等地，攻破郡縣。中平五年這一年，黃巾餘衆起義的很多。據靈帝紀汝南、益州、青徐到處黃巾蠭起，殺刺史郡守。

白波軍後來也沒入豪族部伍中，例如獻帝興平二年，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相攻，劫奪獻帝、楊奉、董承「救駕」，就是依仗白波軍，後漢書獻帝紀云：

「（興平二年）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王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遂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

獻帝初平二年（一九一），青徐黃巾最盛，西攻兖州太山郡，爲郡守應劭所敗。北攻冀州渤海郡，後漢書公孫瓚傳說「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相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大破之」。黃巾從冀州轉回青州，尚有衆二十餘萬，不久又強大起來，據三國志魏武帝紀，初平三年，青州黃巾百萬入兖州。太守曹操大敗黃巾，受降卒三十萬，男女百餘萬口，曹操收其精銳，號爲「青州兵」，於是曹操勢力始大。黃巾平息後，地方軍閥失去了公共對象，互相爭伐，各圖自立，才演成羣雄割據的局面。

## 五

太平道本來興起遠在張角之前，直至張角失敗後，仍然在民間流行，這裏有一個謎，就是太平教主于吉的時代問題，前面所引後漢書襄楷傳說宮崇在順帝時上其師于吉的神書，則于吉年代當在宮崇前，但是在三國志吳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却說于吉以建安時爲孫策所殺，自順帝時代到建安時代已經有七十多年，那麼于吉從初生到被殺就非百歲開外不可了，百歲以上的人當然也有，但要到這樣年紀還能夠

僕僕風塵去傳教，就大有可疑了，我們從各書所記于吉事分析一下，求得解決：葛洪神仙傳宮闈傳：

「宮闈（卽崇之誤）者，瑯琊人也，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山遇天仙，授吉青綠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

這段記載將于吉放在西漢元帝時，顯明是影射夏賀良的事，不可靠，襄楷傳將于吉放在順帝前，到了江表傳，于吉的時代又晚至孫吳了，傳云：

「時有道師瑯琊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籙，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遂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不可不除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

可見這個于吉和張角有基本上的不同，他是爲統治階級「助軍作福」的術士，而孫策却怕他「幻惑衆心」將他殺死，于吉的悲慘下場說明凡與統治階級妥協的人，是沒有好結果的。在孫策方面來說，他把于吉這流人物，看做統治人民的工具，有用則留，沒用或是有害的時候，就要把他殺掉；曹操對付術士們的手腕却是又一套，比孫策「高明」的多，據魏志華佗傳注引曹植辯道論說：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敗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幣而履雲雨，棄六驥而美飛龍哉？」

可見曹操的手段，更爲毒辣。至於于吉的年歲，究竟如何解釋呢？究竟是順帝時人還是獻帝建安時人呢？我們看西洋小說中，一個女巫死後，他的弟子依然帶着她的面具，模倣她的語氣說話，或者魏晉時代社會上，也有這種情形，如抱朴子道意篇說：

「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其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說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亦得瘟病，……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真死也。」

由此可見一個道士死後，常有第二個道士利用他在民間的信仰傳教，前後稱名相同，在這種情形下，常須要遷移地方，以免被熟人所識出，蜀地李阿死後，第二個李阿便在吳地出現，山東于吉死後，第二個于吉便在吳地出現，都是同一的道理，這樣解釋，或者可以解決于吉的問題了。透過于吉的問題，我們可以說明「太平道」的流傳，在黃巾大起義以後，始終潛伏在民間，獲得封建社會被壓迫者羣衆的奉信，如東晉安帝隆安三年（三九九年）浙江農民大起義的首領孫恩，就是「世奉五斗米道」者孫泰的姪子，「太平道」的教義是爭取「最高和平」的快樂世界的到來，歷來農民在苦難的現實生活中屢次參加到這類神秘底宗教形態下的起義活動，前仆後繼地鬥爭着。在另一方更證明農民沒有進步階級作領導，在思想上不能脫離了愚昧迷信的狀態，農民的起義鬥爭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

## 南朝唐寓之所領導的農民起義

賴家度

南朝時（四二〇—五八八年）三吳八郡——會稽（浙江紹興）、吳郡（江蘇吳縣）、吳興（浙江吳興）、義興（江蘇宜興）、臨海（浙江臨海）、永嘉（浙江溫州）、東陽（浙江金華）、新安（浙江淳安）——在經濟上是豐饒地域，政治上佔腹心部份，同時也就是南朝少數土族大地主和廣大農民階級階級鬥爭最激烈尖銳的地域，如同錢塘江上的怒潮日夜在湧湧着，農民武裝起義最著名的有三九九年孫恩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和四八五年唐寓之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孫恩起義時「會稽謝鍼、吳郡陸瑒、吳興丘乂、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①孫恩的主要羣衆是浙東諸郡「免奴爲客」的客戶和農奴，②轉戰經三四年之久，歷經江蘇、浙江海陸各地，農民軍前後死傷二十餘萬人。四〇二年孫恩在臨海戰敗時投海自盡，黨徒也多堅貞不屈，自沈從死者數百人，號稱「水仙」。③這充分表明了窮苦農奴久受封建統治的壓迫，「一朝起義祇有與汝同死的決心」，④農民起義戰爭的力量，瓦解了腐敗的東晉，士族階級的舊政權陷於崩潰，劉裕乘機把東晉的統治權抓到了手中，施行了宋朝封建政治上某些改革，從孫恩等壯烈犧牲以後，又經八十餘年，南朝的社會經濟更有新的發展，而農民在階級鬥爭中更湧現出另一種形

① 見「晉書」卷一〇〇，孫恩傳。

② 見「晉書」卷六四，簡文三王傳。

③ 見「晉書」卷一〇〇，孫恩傳。

④ 引自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五卷。